

寓思於史

文一【美】舒衡哲 (Vera Schwarcz)

譯 孫敏

歷史的真實 被面具遮蔽

如果一個人 試圖打碎這些面具

他會發現什麼

——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一九八〇）

在這本書中，張泉懷 熱情與洞見駕馭了一個極為宏大的題材，對於一個年輕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賦，也是十分難得的。誠然，他已經通過在那本擁有驚人之美的雜誌《生活月刊》上所發表的一系列才華橫溢的報導而產生影響，如今，他又為自己的思想和藝術化的寫作找到了一幅更大的畫布——從晚清到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這段被遺忘或被忽略的城市化的歷史。這些不僅僅是尋常的城市史，而是像歐洲著名的知識份子史研究者卡爾·休斯克 (Carl Schorske) 在其著作《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中所宣稱的那樣，這些努力意在揭開現代人類的面具，超越那些城市化進程的辯護之聲，真實地為活生生的生活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新視角。這無疑

更有創意，也更具意義。

《城殤》在很多方面獨樹一幟。近年來研究中國城市個案的歷史書籍很多，相較之下，張泉更加有野心，他探討更多的主題，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城市的秘密敏銳地提出了新的問題和見解。他有意從上海的霓虹燈中轉過臉去，轉而聚焦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改良者的思想和經歷，其目的是幫助我們回溯和還原曾一度被遺忘的道路，它們關乎歷史的回聲，關乎革新的途徑。有多少人還記得作為水利專家的張謇？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也曾致力於解決困擾南通乃至中國千年已久的水利問題。現在在西方城市的天際線都是被高樓大廈分割的，而張泉通過他的研究才能和栩栩如生的寫作，使當代讀者能夠重新思考那些業已消失的風景。有多少人還記得那些富有遠見卓識又極具爭議性的軍人？譬如孔繁錦，在甘肅天水的種種舉措；譬如劉文輝，曾以富有創意的措施解決西康的宗教問題……他們打下的基礎，無人能出其右。

這些人物和歷史細節，嚴謹地呈現在這本書中，就像重新追憶一場失落的夢境。這正是休斯克倡導的「帶 歷史思考」，在這種思考方式中，「過去」的素材常常有助於適應和組織「現在」與「將來」。同時，這不僅僅是利用過去為現在服務，張泉像前輩學者休斯克一樣，讓我們接受挑戰——重新思考一切城市發展的敘事範式。

劉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曾在《城市發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 中探討現代西方和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通過科學勘探，佐以詩意的語言，芒福德認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將權力轉換成形式，將能量轉換成文化，將無趣的事轉換成鮮活的藝術符號，將生物繁殖轉換成社會創造」。如今，一個年輕的中國作者已向這一高度發出挑戰。

張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樣大膽：當歷史健忘症的瓦礫已經覆蓋了朱啟鈴、張靜江和盧作孚等城市化先鋒之際，張泉也在尋找機會，試圖從這些三瓦礫堆中挖掘文化和社會創造力的希望。他意識到，革命的颶風會一再清掃中國的城市，於是，他用書寫創造出一個空間，來安放當下對於歷史與未來的回聲。事實上，這已是罕見的成就。

二〇一一年三月，於耶路撒冷

舒衡哲 (Vera Schwarz)

著名漢學家，生於羅馬尼亞，猶太裔美國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現任美國威斯理安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歷史系及東亞系教授，獲弗里曼教授席位 (Freeman Professor) 並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七九至八〇年曾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除了歷史研究之外，她還寫作詩歌和短篇小說。著作主要包括《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張申府訪談錄》《鳴鶴園》*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 *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 以及詩集 *Chisel of Remembrance* *A Scoop of Light* 等。

被淹沒的雄心

文一許知遠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大約五年前，我問張泉。他剛剛大學畢業，成為《生活》的一名記者。他安靜、羞澀，頭髮亂蓬蓬。

他說他仰慕雨果那樣的人，能影響一個時代的氣質。這個回答出乎意料，這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上海，而不是一八三〇年代的巴黎，英雄主義已夠不合時宜，他竟還想成為一名文化英雄，靠文字來塑造時代。

在日漸熟悉的日子裡，張泉向我展現了一個多姿多彩的內心世界。他談論《後漢書》，感慨倘若漢代使節甘英跨過了伊斯坦布爾的海峽，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就會從此不同；他說起戰後一代法國知識份子的紛爭，加繆（Albert Camus）如何比薩特（Jean-Paul Sartre）更有道德立場；他還猜想，被擄掠到依蘭的兩位北宋皇帝的心境。

當然，他最喜歡提及的還是清末到民國的幾代知識份子——他們面對一個舊秩序崩潰的時代，既茫然、焦灼，又釋放出巨大的創造激情。

這本《城殤》是這種熱情與好奇的延伸。他談論了天津、上海、香港、哈爾濱、長沙、康定、南通等諸多城市。它們是現代中國演變的縮影，更與一小群傑出人物的努力

相關。張泉沉醉於這些燦爛卻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們的理念。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復記憶。現代中國飽受失憶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廢墟上重新生長，它既容易令人陷入無根之痛，缺乏足夠的精神與智力資源；又可能引發盲目的驕傲，以為自己的成就就是獨一無二的。

這本書當然也有缺陷。有時，他太屈從於自己浪漫化的情緒，一些詞句太過悲情。有時，他放棄了自己更直覺的觀察與判斷，被資料牽引，倘若他能在歷史敘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與思考，行文無疑會更引人遐想。

不過，這仍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這些被淹沒與遺忘的雄心與掙扎是人類生活中最燦爛的一刻。

二〇一一年六月，於北京

許知遠

畢業於北京大學微電子專業，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現任《Bloomberg 商業週刊》（中文版）主編，《亞洲週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他也是單向街圖書館的創辦人之一。著作主要包括《那些愛傷的年輕人》、《中國紀事》、《醒來》、《祖國的陌生人》、《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轉折年代》、《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納斯達克的一代》、《昨日與明日》、《思想的冒險》、《新聞業的懷鄉病》等。

序一

寓思於史

序二

被淹沒的雄心

前言

城市想像與現代中國

18

8

4

第一章

將軍令

000

——安慶

曇花摧城

在安慶，自稱天主次子的洪秀全，沒能像摩西那樣用權杖劈開突圍之路；石達開、陳玉成和李秀成們，也沒能統率士兵們找到被許諾的天堂。

太平天國最後的賭注葬送在安慶，曾國藩復興帝國的希望也錯失在安慶。軍械所的創辦終究未能觸及這座城市的內核。在城市世紀的門檻前，先行一步的安慶，註定曲高和寡，成為現代城市理想的殉道者。現代化之夢，終如曇花凋零，颶風過境。

000

——馬尾
向海而生

馬尾造船廠的興衰，並不是理解近代中國的鑰匙，而是一把鎖。有太多的疑點需要開啟，關於權力如何瓦解了理想、陸地如何吞嚥了海洋。

面對重新開放的漫長海岸線，中國人被迫在亂局中重拾失落的海洋夢想。長達四百年的殘酷遺忘，令這場復蘇的海洋夢顯得沉重而笨拙，它未經重新消化便被囫圇嚥下。馬尾的悲劇，不過是中國急功近利的現代化想像孕育的又一個意外的早產兒。

000

——天津
復興的幻象

接管一座生靈塗炭的城市，或者重建它，固然任重道遠。與此相比，更加艱難的是接管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甚至，它的發展勢頭比從前還要兇猛，它從未如此風華絕代。

此刻的天津衛，已不是從前那個在北京面前恭順謙卑的孩童，它已經學會奔跑，怎能繼續跟隨衰老的帝都一道步履蹣跚？面對已經嘗到現代化甜頭的天津的紳商與黎民，袁世凱要怎樣努力，才能化解他們對帝國業已疏離的敬畏之心？

000

香港——
劫墨重生

金融業是現代世界送給香港的見面禮，就像普羅米修斯盜取的天火——它能賜人間以光明與溫暖，卻也能將一切化為灰燼。

金融業也是香港送給中國內陸的見面禮，就像赫菲斯托斯送給母親赫拉的金座椅——抗拒註定是徒勞的，越是抗拒越被她牢牢困住，不過，這困縛也讓她痛定思痛，開始反思，嘗試改變。

經由香港洶湧而至的現代文明，不僅瓦解了中國的金融秩序，也顛覆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從荒島到香港，從「劫墨」到「諾言」，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金融業成就了香港，也遮蔽了香港；成全了中國，也摧毀了「中國」。

澳門——
上帝與誰同在

在中國，很少有哪座城市的教堂和廟宇的密度能超過澳門。耶穌、聖母、關公、孔子、佛祖、媽祖，甚至魯班、哪吒……有時候人們會感到迷惑，這座方寸的小島，怎能容納得下這麼多位神靈，這麼多種語言，這麼多罪惡與蒼涼？但欲望總是最強大的塑造力，從不亞於最虔誠的信仰。

從荒島到香港，從「劫墨」到「諾言」，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金融業成就了香港，也遮蔽了香港；成全了中國，也摧毀了「中國」。

哈爾濱——
永夜的極光

傳家店的農民們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停止了思考，用舌尖攪動一下口中清冽的「田家燒鍋」，讓這股火一樣的燒酒沿喉管緩緩淌下。他們不知道，自己很快就會開始懷念這股味道。田家燒鍋坊馬上就會被俄國人徵用，充當中東鐵路建設的指揮中心。不過，他們也會立刻找到新的替代品，用不了多久，各種名目的啤酒廠將會出現。啤酒的味道還沒有「田家燒鍋」濃烈，但是黏稠醇厚，甚至有些甜蜜的回甘。哈爾濱人嘗到的第一口現代化的味道，就是這樣馥郁而簡單。

長沙——
歲在庚戌

一九一〇年的長沙，人潮很快也會散去，街市依然繁華，似乎沒有什麼能真正撼動這座城市，更無損於既有的制度。它曾蓄積起來的駭人能量，正在迅速冷卻，回歸平靜。那些曾掀起滔天狂瀾的人們，要麼斷頭，要麼蟄伏，要麼離開，如同四散在荒野中的星火，轉瞬便可能被黑夜吞噬。大廈將傾，棋局未定，沒有人知道，誰還能在這個凋敝的時代再度出手，力挽狂瀾。

只有學堂裡那些籍籍無名的年輕教師們，還會偶爾向學生們講起過往十餘年的風雲往事。那時坐在台下聽講的，有十幾歲的匡互生、蕭子升、蔡和森和毛澤東。雲集於長沙的下一代人，將用怎樣的方式紀念戊戌年以來的流血故事？這關係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未來的命運。

上海——
暗戰四馬路

人們在彷徨與期待中送走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那一天；而開學的日子，也迫在眉睫。

市面上真正「合法」的教材，只有《中華教科書》。它的內頁裡印「愛國旗，愛中華」，它毫不掩飾地歌頌孫中山，說他「為共和奔走二十餘年」，「為中國第一偉人」。

最令人無法抗拒的是，大清帝國的黃龍旗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中華教科書》的封面上，那面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熠熠放光。

這家名叫中華書局的出版社，簡直是為中華民國而生的。

北京——
遊園·驚夢

民國開元後，北京依舊如同一塊頑石，時代的刻刀似乎無從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琢痕。革命擊潰了一些固有的習俗和儀式，而人們渴慕的新式的生活方式，卻遲遲未能建立起來。沉沉暮氣之中，公園計劃再度被寄予厚望。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日，改造後的社稷壇以中央公園之名開放。北京民眾蜂擁而至。在舊日的皇家園林中興奮得幾乎迷路的人們，已經無暇談論內務總長朱啟鈐玩物喪志這樣嚴肅的話題。

南通——
千里涉江

張謇的命運，早在他穿梭在京城鱗次櫛比的屋簷下被暴雨濕透的時候，就已經被提早寫定。

他的時代嫋嫋來遲，但終究還是來了，駕馭 風雷，裹挾 雨霧，一場數十年不遇的暴雨和水患，與這個清廷數十年不遇的專業狀元之間，建立起微妙而神秘的關聯。與日後眾所周知的實業家身份相比，其實張謇畢生與治水糾纏——因治水而改變命運，因治水而披肝瀝膽，為治水而生，又終究因治水而死。

杭州——
破繭之城

西湖博覽會開幕定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閉幕則初定於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節。

為什麼選定六月六日，如今已經找不到任何線索。如果過度闡釋其中的因緣巧合，那麼，這一天是芒種之日，按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解釋，芒種為「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而中國人也一直習慣在這一天舉行祭饒花神之會。

播種與饒花，一為開始，一為結束。許多年後人們會發現，西湖博覽會之於杭州乃至整個中國的意義，正是為未來播種，並向過去告別。

漢口——
民主的邊緣

如果一個旅行者選擇了一些並不恰當的時機抵達漢口，他很可能會被報紙惹得精神錯亂。

他在前一天夜裡睡下時，還躺在一座叫漢口的城市裡，次日早晨當他被街頭報童的叫賣聲吵醒，他們手裡揮舞的新聞裡，這個城市的名字已經變成武漢。又或者，當他深夜在客棧獨酌時，他所在的位置已經從漢口特別市變成了湖北省的一座普通市。

在民國的地圖上，漢口一直在原來的位​​置，只是環繞它的曲線卻像火燒雲一樣變幻莫測。

漢口的民主化之路，也像這座城市不斷變化的名字一樣，始終沒能擺脫權力的怒視。

北碚——
「賽先生」的救贖

一九四三年，李約瑟（Joseph Needham）驚訝地發現，中國「最大的科學中心」竟在小鎮北碚。中國知識份子在筆路藍縷中追尋科學的熱忱，讓李約瑟大感欣慰，也加劇了他的迷惑。歷史證明中國人如此聰明，現實又證明了中國人對科學的鍾愛，為什麼中國的近代科學依然如此落後？「李約瑟難題」與中國科學家的孜孜不倦形成鮮明對照，並因中國人對光明的嚮往，而變得更加晦澀。

天水——
死水微瀾

被稱為「罪惡軍閥」的孔繁錦，和伏羲一道開創了天水的兩個時代。伏羲讓天水甚至整個中國從蒙昧走向文明，而孔繁錦則伴隨 沸騰的民怨，像那頭牽引 汽車的耕牛一樣，將這座邊城引入現代世界。

南寧——
夢斷德鄰路

一九三四年元月，德鄰路落成。李宗仁和這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一起，接受 南寧官員、社會名流的膜拜與期待。德鄰路因此被賦予多重象徵意義，也從誕生伊始就註定要直面冷箭與明槍。

康定——
孔子與佛陀

劉文輝不斷地試圖在這片幾乎寸草不生的土地中播種下更多的希望。有一天他帶 全家人郊遊，站在跑馬山上，滿懷憧憬地告訴大兒子，爸爸以後要在這裡建一所大學，一座醫院。

有那麼一瞬間，他誤以為自己真的看到了未來。



結語

失控的搖籃

跋

那些旅行

參考文獻

000

000

000

城市想像與現代中國

從天下到城市

「不管中國人擁有什麼樣的才能，也肯定與建造城市無關。」美國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gowan）在一八六〇年來中國，並在這裡生活了長達五十年。他發現，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既缺少建造城市的熱忱，更匱乏規劃城市的方法。多年以後，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表達了同樣的困惑：「中國人從沒有感到要創建一座能表達和體現他們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衝動。」

他們的判斷，既深刻，又偏頗。

千年以降，中國人始終在坐談「國家」、「天下」，與這些宏大空洞的命題相比，「城市」這個概念過於精細，以致到晚清民國時，當中國人試圖在城市的拱樑上建構國家復興的理想，真如同讓一個習慣於塑造巨型紀念碑的建築師到米粒上雕刻宮殿，一時竟無從措手。

但是，中國歷史上其實不乏規模龐大、形制兼備的城市，甚至在宋朝和明朝也一度出現過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城市的萌芽。只不過，中西方的理念頗有差異。中國的城市，並不是圍繞教堂或者廣場為圓心輻射出來的，這個國家對神靈態度曖昧，更拒斥

廣場式的民意，因此，佔據城市重心的，並不是神靈的「道場」，而是權力的殿堂，而西方城市在文藝復興之後出現的公共空間的增長，也始終沒能在古代中國發生。與西方相比，中國變本加厲地迷戀城牆——無論是為一座城市選址，還是分割其內部的格局，首要考慮的往往不是宜居，而是如何凸顯統治的權威，對外可以應對軍事衝擊，對內便於社會管理。這種境遇，即便是有「天堂」之譽的蘇杭也未能倖免。城牆將風景與生活截然分開，城外是中國人嚮往的桃花源，城內則是被各種複雜「關係」困縛的禮教世界。

問題在於，從晚清到民國，天下已不復當日的天下，城市也不復從前的城市。

無論中國人怎樣抗拒，他們所認定的世界中心都已經發生位移。「天下」已經從九州、五湖、四海，變成了張之洞的「亞歐」、袁世凱的「東西兩洋，歐亞兩洲」、梁啟超的「環球」、胡適的「繞太陽的地球」。¹ 中央帝國一夕之間淪為海中孤嶼，面對四伏的危機，無從招架。

如果按照傳統邏輯，當人們在現世找不到出路，往往會尋求上古的案例，以啟迪當下的行動。晚清以降，這一邏輯卻遭到無情的顛覆。從前都是異國的使節們競相模仿中國的步法，現在這個偌大而衰老的帝國卻要開始重新蹣跚學步，淪為一個虔誠而笨拙的模仿者。

從向過去尋找答案，到向外界尋找答案；從反求諸己，到問道於人——自閉的文化觀念最終走向末路，到容閔的時代，中國人開始相信，「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²

鍛造「少年新中國」，不僅需要萃取西方之火，熔鑄東方之刃，更需要一座合適的熔爐，來安放復興的理想。然而，國家積弱不堪，歷朝秉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雖然仍在艱難地開展，卻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與此同時，封疆大吏、軍人和士紳們卻發現，城市可以成為寄託現代化理想的絕佳容器，城市的物質基礎、文化密度，以及多元化的思想觀念，都更有助於現代化進程的提速。於是，變革的星火從局部萌動，在城市中，中國人開始了構造「少年新中國」的努力。

這些努力帶來了顛覆性的結果，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觀察中國》（*China Watch*）中寫道：「受現代變革壓迫的中國文化比起歷史上別的文化是最獨特、鮮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給自足、平衡和龐大的。因此，中國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間斷發生的周期性革命，是歷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³ 這場「最深刻和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得益於城市的助力，也轉而深深地影響 城市的風貌和日常的生活。

由長安、洛陽、汴梁、杭州、金陵、北京歷經千年架構起來的城市參照體系，最終土崩瓦解；由班固、張衡、左思和張擇端、仇英、徐揚們為中國的傳奇都會編織起來的綿密意象，同樣敵不過西方城市的當頭一擊。⁴ 從前，當中國人試圖稱讚一座城市，會稱它為「小南京」、「小蘇州」、「小西京」；後來，無數以「東方的」為前綴的新興城市卻在這片黃土地上不斷湧現，「東方的巴黎」、「東方的倫敦」、「東方的莫斯科」、「東方的芝加哥」、「東方的威尼斯」、「東方的蒙地卡羅」……從中心滑向邊緣的過程，最終毀滅了帝國，卻締造了城市。

再見理想國

從晚清到民國，一個世紀。

一個世紀足以代謝四代中國人。

在城市的囂塵上，四代人面向新世界開始了冒險的歷程。他們是一群仍然穿 長袍、工整地繫 襟扣的傳統知識份子，他們是一群說 流利的外語卻甘赴國難的新派留學生，他們是一群拭去手上的鮮血、努力試圖建造一個好國家的軍人，他們是一群剛剛剪斷辮子、在失去頭部的重量之後滿懷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普通中國人……他們輪番地衝擊、拚殺、搏命、以身相殉，只是希望這個時代能更好些。

中國人對理想國的想像，從未如此迫切。

無論是出於地方主義的激情，還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本能，獨守桃源南山的夢想已註定支離破碎。以城市為基點，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前景將難以抗拒地被捆綁在一起，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整個國家因理想主義而沸騰，也因理想主義而焦灼。人們別無選擇，只有用自己一瞬的生命，去填充這個國家失控的將來。於是，各地不斷出現的城市散點，在亂世的荒漠裡，在古老中國皸裂的版圖上，結出璀璨的星河——直到今天，我們仍生活在他們締造的歷史之中。

事實上，在那一個世紀裡，冷靜的思考、甄別與建造，一直與毫無節制的激情、偏見與破壞欲，共同構成中國現代化的雙行道。布萊克（Cyril Edwin Black）在《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中寫道：「許多歷史學家執迷於各種革命，妨礙了他們更多地注意帝王、君主和官僚所從事的初級階段的現代化改革。」⁵ 早期的變革，

固然有其幼稚、衝動乃至偏頗、殘酷的一面，但我們不能因此便否定它的想像力、使命感、苦心經營與不凡成就。當年的種種舉措，足以令人驚歎，並給今日以啟迪。

然而，那些拓荒者的身影，大多已被夜空吞噬。

我們只知有現在，卻不知現在從何而來。

悲劇性的伏筆

這本書是從安慶開始的。不是因為它的開端意義，而是它失敗的價值。在曾國藩以軍械所為基點經營安慶時，帝國仍在現代化的黎明前徹夜踟躕。國人無法理解現代城市的含義，就像誤以為堅船利炮就是西方文明的全部菁華一樣。安慶的曇花一現，暗示中國傳統的城市理念與西方現代城市邏輯之間難以彌合的裂隙。在城市世紀的門檻邊，先行者安慶沒能邁出的決定性一步，同樣在未來誘惑並考驗它的後來者。這個悲劇性的伏筆，敦告中國人該如何善待他人的歷史，甄選自己的道路。

我仍然記得一些誇張的畫面。大約在二十年前，我在一本學生雜誌裡第一次見到曾國藩的名字。短文旁邊配一幅簡筆畫，說的是曾國藩又被太平軍逼得走投無路，又一次假惺惺地揚言要跳河自盡，兩個幕僚死命拖住他肥胖的身軀。這個被篡改過的故事，把「桐城派」最後的宗師塑造成一個無知又怯懦的小丑。那時已是一九九〇年代，曾國藩卻仍被視為封建衛道士，慘無人道地鎮壓正義的農民起義，階級鬥爭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連學生讀物也未能倖免。當然，也沒有人像魯迅那樣喊一聲「救救孩子」。它們就那麼輕易地塗抹了一代人的歷史觀。

許多年後，我在圖書館氾濫霉味的空氣中尋找曾國藩的名字，色彩晦暗的《曾文正公家書》和《曾文正公著述八種》早被藏之深閣，各種光鮮華美甚至燙金的曾國藩新解，則佔滿了書架，一排排望不到邊際。曾經被侮辱與損害的曾文正公，已經被奉為管理學巨匠，他的那些遭到斷章取義的家書，被視作企業家必讀寶典。經過商業化和娛樂化兩輪衝擊，我們時代的歷史觀終於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我們對歷史的無知，源於惰怠，源於媚俗，源於恐懼，源於傲慢。

一百多年前，曾國藩的遺像曾遠渡重洋，掛到美國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學事務所裡。那些拖辮子試圖救亡圖存的中國留學生們，每次見到這位在牆上沉默冥思的老人，都會在心中反芻一遍：是誰給了自己這個開眼看世界的機會。那時的曾國藩，是作為一個引路人，而不是作為一個笨拙的統帥或者圓滑的官僚而被銘記與感懷的。通過這本書，我也希望尋找那些業已消匿的蹤跡——是誰在黑暗裡提燈夜行，將迷失中的帝國引到現代世界虛掩的大門前。

城市之光

由於歷史斷層的存在，許多人在一座城市中出生、成年、度過一生，對自己的城市和它的歷史或許依然一無所知。那些被淡忘的歷史，就像是一條曾經從城中蜿蜒而過的河，現在可能已經乾涸，甚至被樓宇的地基掩埋，但它會生動地流過，並將繼續流下去——只要我們願意在夜深時重新傾聽這些來自歷史深處的暗湧。

我選擇了十六座城市作為切片，分別從市政建設、民主探索、金融秩序、實業振

興、軍事化轉向、公共空間的營造、文化轉型、宗教改革，甚至博覽會的影響等角度，去尋找它們在歷史中的基因突變，以及現代中國的成形。

這個計劃持續了四年多。除了一些常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資料，主要使用的是地方志、地方文史資料、對地方知識份子的採訪記錄等原始文本。我希望對這些相對零散平實的素材，進行大歷史背景下的重新觀察與整合，通過對這些個案的探索，勾勒出時代的整體風貌。

第一章集中於中國內部對城市化的早期探索。安慶的軍械所和馬尾的造船廠、船政學堂，是洋務派給這兩座小城帶來的一線生機。然而，在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城市觀念依然根深蒂固，西方的城市邏輯更被視為無物，先行者安慶與馬尾沒能完成的使命，最終留給天津。經過李鴻章的苦心經營，八國聯軍的改造，以及袁世凱的力挽狂瀾，這座曾經的衛城從帝國的版圖中脫穎而出，在警務、教育、民生等領域頗多建樹，與袁世凱的個人神話相互應和，成為晚清城市化的一塊活化石。這三座城市的興衰浮沉，暗示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人正如何艱難地跨越東西方城市理念之間的鴻溝，尋找革新的道路。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城市理念在中國留下深刻的投影，第二章所描述的三座城市——香港、澳門與哈爾濱，就是三種不同的烙印。這三座城市迥異的命運背後，站立 英國、葡萄牙和俄國三個巨人。英國的重商主義理念建立起香港的城市品牌，不僅顛覆了整個中國的金融秩序，更締造了嶄新的城市想像；澳門的相形見絀則是葡萄牙時代落幕後的又一次慘烈回聲，大航海時代的殖民邏輯已經徹底失效，葡萄牙人的急功

近利與無所作為，最終造成了澳門的畸形格局和詭異的城市夢想；俄國則代表 另一種保守的力量，他們仍然熱衷於征服土地，大規模移民，依靠信仰系統和商業手段，進行「去中國化」的嘗試，並由此開拓了邊城哈爾濱，只不過，半個多世紀後，這座信仰的天堂，最終還是功虧一簣。這三個案例都可以成為中國人認知西方城市理想的鏡子，也影響 中國人對城市夢的選擇。

第三章聚焦於時代交錯的那些瞬間。辛亥革命前後的幾年，三座位居「風眼」的城市，都在平靜中暗藏玄機。在長沙，人們建立起一組此起彼伏的烏托邦的共同體，維新、君主立憲、暴力革命、新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各種溶液在城市的試管中混雜、融合、排斥、爆炸。這座城市被不斷地填充，不斷地賦予新的意義，長沙令時代側目，也影響 新生的一代和未來的中國；在上海，中華書局選擇與民國政府在同一天成立，通過教科書改革和出版業的自由競爭，佔據了文化的高地；而在北京，公園經歷了符號化的不斷嬗變，最初與西方文明嫁接，後來變成權力的象徵，最終卻又成為民主的容器，北京公園的命運，暗示 中國向現代文明過渡過程中的諸多峰迴路轉。

而在第四章，我希望探討的是專家治國在晚清民國的成效及其困境。在南通，張謇解決了困擾國家幾千年的水利問題，他不僅是最負盛名的實業家、狀元，更是一位水利專家，因水而生，為水而死，這一點往往被人忽略；在杭州，被孫中山視為財政第一人的張靜江，通過博覽會的形式來改造這座傳統都市，最終促成了它的現代化嬗變；而在漢口，市政改革曾讓這座城市瀕臨民主的邊緣，卻終究還是與之擦肩而過。專家與權力之間的相持，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牴牾，加劇了民國的悲劇。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裡對明朝的文官制度有過精彩的分析，而他自己生活的民國時代，其實正提供了一種反向的案例——軍國理想蠱惑中國人長達半個多世紀，軍人成為統治者，用各種匪夷所思的思路治理國家，改造城市，收穫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果實，也帶來了經久不散的陰霾；與此同時，士紳階層的個體探索，交織濃厚的使命感與霸道的家長意識，同樣塑造出不少城市傳奇。這兩種統治模式在民國都氤氳出新的氣象，也引發了新的危機。第五章記錄的主角們都會進行過諸多有益的實踐——孔繁錦在天水發展實業，盧作孚在北碚振興西部科學，李宗仁和白崇禧以斯巴達式的軍國理想營建南寧，劉文輝通過儒家與佛教的合力來調和西康的民族問題……只不過造化弄人，萬曆十五年的糾葛仍將在軍人與士紳的心理板結中繼續衍生。

現在，這些城市往事大多已經化成灰燼，但它們並未消失。它們只是在帝國的深秋裡，隨蕭蕭墜落的楓葉一道匯入大地，與這個國家的骨骼血肉融為一體。因此，當我試圖尋找這些被湮沒的城市往事時，不可避免地需要撬動整個國家和整個時代。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出版半個世紀後，仍遭到他的同學埃德蒙特·利奇(Edmund Leach)的質疑，「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⁷事實上，沒有一本書或一套書可以承擔這樣的功能。我無法做到費孝通先生那樣長久而深入的實地調查與研究，也無法(更無意)上升到純學理的高度。我試圖做的是勾勒出那個時代模糊的天際線，找回那些在鴻蒙中墜荒的身影，那些已經被我們的時代淡忘或篡改過的面孔。但我希望尋找的角度是相對完善的，能夠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信仰、歷史地理學、城市理論、水利學、移民史等視角進行不同的觀察和反思，從這十六座城市中尋求一些規律性的啟示。事實上，許多當下的問題，也都能夠從中找到答案。我相

信這些來自歷史深處的轉瞬即逝的光亮散點，依然能夠幫助我們照亮現實的迷惘。

重回歷史現場

當代的歷史敘事，無論是學院派的研究，或者暢銷作者的戲說、演義，都曾標榜「重回歷史現場」。

我認為，「重回歷史現場」不僅僅是回歸史實的真實。

絕對的真實或許並不存在，歷史本身就是一個「羅生門」式的記憶陷阱，我們只能盡可能地尋找材料並運用材料，盡可能地考證、斟酌、比較而已。

我更為看重的是對歷史「在場感」的探索，我希望喚醒我們時代對歷史的感官體驗，從視覺、嗅覺、聽覺乃至情感、心境上，重回歷史現場。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李孝悌先生在《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禎在揚州》中曾如是描述歷史敘事面臨的問題：「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這種「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的缺失，在晚清民國的歷史敘事中，同樣有待復活。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做出這樣的嘗試，在嚴肅的學術研究和散漫的「話說」體之外，走這一條新路。

在從前的閱讀中，我曾經從劉易斯·芒福德、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凱文·林奇(Kevin A. Lynch)對城市史的探討中獲得過啟示，也從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黃仁宇和孔飛力(Philip A. Kuhn)的敘事中找

到過精神的共鳴。在這本書裡，我也嘗試重新發現一些各地的文史資料中潛藏的素材，希望把這些零碎雜亂的線索串聯起來，從細處摸索大歷史的地礦脈絡。

周作人在閱讀梁啟超的《飲冰自由書》和《中國魂》後，接連在日記中寫下「美不勝收」四個字。⁸在梁啟超的時代，思想與歷史之中仍蘊涵美，它們超越了技術層面的編年史序列，也迥異於乏味的理論堆砌，它們令人感動，讓人嚮往。我希望喚醒歷史寫作之中沉睡的美——無論是敲碎時代堅硬的果殼還是用徒勞的祭文為往事招魂，無論是發現真理還是再現傳奇，是在希望中重述，抑或在絕望中反思，是從殘缺中感知故去的美好，或者在迷障中觸摸真相的力量。這是我書寫的直接目的，我或許永遠都無法抵達，卻一直在試圖靠近。

我想，現在我也可以回答許知遠的質疑。

這本書確實以歷史為重心，但從未迴避現實，所有的歷史敘事正是建立在反思現實的基礎之上。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也不過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胸中塊壘。

陳寅恪晚年作詩多用曲筆，用曲筆不是因為恐懼，更不是炫技，而是他希望這些文字可以曲折地活下去。因為只有活下去，它們才會在某一天被翻開，才會喚起一些記憶，震醒一些靈魂。

這是我對《城殤》的期望。

註釋

1. 張之洞為黃鶴樓題聯：「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袁世凱：「東西兩洋，歐亞兩洲，只手擎之不為重。吾將舉天下之士，席捲囊括於座下，而不毛者，猶將深入。堯舜假仁，湯武假義，此心薄之而不為；吾將強天下之人，拜手稽首於闕下，有不從者，殺之無赦。」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爾來環球九萬里，一砂一草皆有主。」胡適《旋》：「念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2. 容闈著：《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八十八頁。
3. 東漢班固《兩都賦》、東漢張衡《二京賦》、西晉左思《三都賦》，都是中國古代書寫城市的名作；北宋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明朝仇英有《南都繁會圖卷》（署名仇英，是否為仇英所作，有爭議）、清朝徐揚有《姑蘇繁華圖》，都是中國古代描繪城市風貌的長卷畫作。
4. 【美】費正清著，傅光明譯：《觀察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二十頁。
5. 【美】J. B. 布萊克著，段小光譯：《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九十頁。
6. 「得受文明教育，當知是文正之遺澤，勿忘所自來矣。」根據楊國強著：《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徘徊：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第五十一頁。
7. 費孝通著：《費孝通選集》，海峽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六八頁。
8. 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二頁。